

# 漳平党史人物研究



郑超麟(前排左三)与周恩来(后排右一)等1923年在法国留影。

中共漳平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 漳平党史人物研究

编 审：林有才

主 编：黄文光

中共漳平市委党史研究室 编

二〇〇三年六月

# 序 言

郑庆荣

这是一册关于党史人物的资料汇集和生平研究，其对象是二位建党初期的共产党员和一位老红军。他们都出生于漳平这座群山环绕之中的山城，都在“走出去”的岁月里演绎了各自不同的人生，都是那个年代的“佼佼者”。他们是很有代表性的，代表着在大浪淘沙的革命洪流中各式各样的人物，反映了他们的复杂经历和不同命运。

郑超麟、陈祖康都是1919年11月选派到法国巴黎勤工俭学的青年学子，也都在巴黎接受了共产主义信仰而走上了革命道路。郑超麟的斗争生涯主要是“思想传播”，他的杰出贡献在于引进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卓有成效地从事的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新青年》的编辑工作。虽然他紧跟陈独秀也跟着陈独秀一起“栽了”，但他以毕其一生的不懈努力所研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亦当是一份宝贵的党史资料。陈祖康在法国西方工学院毕业后，立即被该校聘为该学院的助理教授。他学的是理工，却因国内革命吸引而放弃专业回国了。先到黄埔军校任教官，黄埔军校的校歌就出于他的笔下。后又回福建从事革命活动，1928年曾担任福建临时省委组织部长、书记。但不久“跳槽”了，竟变成了国民党的一位少将。这种出乎寻常的信仰嬗变、立场转移，不也是很值得思考和研究的“思想问题”么？

陈开路原名陈光照，16岁就参加红军。他没有上述两人那样

错综复杂的生平,但他身经百战,出生入死的经历可真叫人叹为观止!单参加五次反围剿就打了一年之久;接下来就是长征途中的“抢夺安顺场”、“飞渡泸定桥”;解放战争中又参加“平津战役”、横渡长江、解放广州、攻打海南岛等等。由于他总是冲锋陷阵而又无攻不克,被战友们称之为“开路先锋”,以至于连原来的名字也被更改了。对这位南征北战的骁将,只要听一听他那寥寥数语的“打战经验”,就可以“窥一斑而观全豹”,使人很快领略到这位老红军战士的非凡风采。他说:“面对敌人的枪炮时,不能直线冲锋,要用‘S’形反复行进;吃饭不宜过饱,子弹打到肠子就不容易破,水壶里装点酒,既当饭又解渴……”。这些话,听起来颇为好笑。细想一下,如不是屡经枪林弹雨而又英勇善战,有谁能说出这样的话呢!

编入此册的这三位都可谓“重量级”的历史人物。对他们的研究无疑有助于我们更好地了解党的早期历史、了解早期投身革命的党史人物。所以,我认为它是很有意义的。特别是本书不同于那些非褒即贬的文章,它的最大特点在于不是一路赞歌,不是纯粹批判,而是再现史实与资料,唤起人们深邃的思考,深层次地去感受历史的启迪。

我对黄文光同志潜心党史研究的事业心十分敬佩。他近几年连续出版的《漳平人民革命史》、《漳平之光》、《漳平党史研究》、《生命乐章》、《红杜鹃》等几本书我都看了。在深受教益的同时,也感到了一种新奇:漳平这地方,怎么会如此集中地涌现出这么多的杰出人物?莫不这就是所谓的“人杰地灵”吧。

(作者系中共福建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

2003年6月3日于福州

# 目 录

序言····· 郑庆荣(1)

## 郑超麟纪事

世纪老人——郑超麟····· 黄文光(3)

解读《世纪老人——郑超麟》····· 郑庆荣(6)

我与中共福建“一大”····· 郑超麟口述(12)

郑超麟与陈独秀思想····· 郑庆荣(21)

闽西最早的共产党员····· 郑学秋(31)

郑超麟先生年谱····· 罗 岩(33)

“老托派”郑超麟坎坷一生····· 靳树鹏(41)

不寻常的世纪老人郑超麟····· 华校生(60)

郑超麟传····· 华校生(65)

六十年前一场世界性争论····· 郑超麟(93)

## 陈开路之路

“开路先锋”····· 黄文光(100)

我的道路与中国革命····· 陈开路(105)

陈开路同志生平····· (124)

## 陈祖康拾遗

陈祖康与黄埔军校校歌····· 黄文光(131)

我撰写黄埔校歌经过····· 陈祖康(1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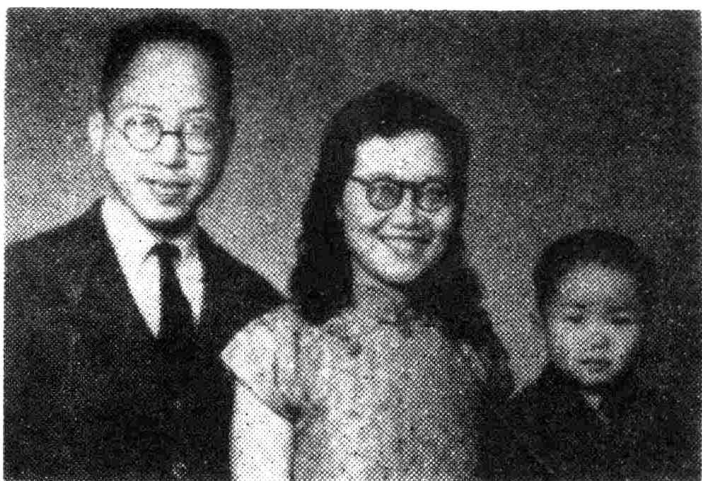
原全国政协委员文强的来函····· (136)

陈祖康简况····· (137)

后 记····· 黄文光(140)

# 郑超麟纪事





郑超麟一家（摄于1942年）

## 世纪老人——郑超麟

郑超麟，福建漳平人，生于1901年4月15日，1998年8月1日在上海逝世，享年98岁。

郑超麟少时刻苦读书，勤奋写作。上小学时，老师有“高谈雄辩惊四筵”之赞；上中学时又被先生称为“笔老气苍”。由于他学业优异，1919年6月在龙岩省立第九中学毕业后，于同年秋被选派到法国半公费留学。1919年11月4日，福建各县选派的30多位留学生在香港登上“保罗·列嘉号”大邮船，一个月后到达法国巴黎进入圣日尔曼中学。1920年底，因经费紧张，开始勤工俭学。1922年2月，进入蒙尔达橡皮厂做工，住在森林中的一个木栅屋，同住在这里的还有邓小平、李慰农等30多人。1922年，赵世炎在旅法华人中进行共产主义组织活动，6月18日，在巴黎成立“少年共产党”，后称“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旅欧支部”。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赵世炎、周恩来等18人，郑超麟也是其中之一。1923年3月，“少共”组织派郑超麟等12人去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4年春，郑超麟在莫斯科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当时闽西南最早的共产党员，李大钊出席了旅莫支部举行的郑超麟入党仪式。在莫斯科期间，郑超麟接待过以蒋介石为主任代表的孙逸仙访苏代表团，参加了列宁的葬礼。

郑超麟是我党早期传播马列的先驱者之一。1924年7月底，他奉命回国，在中共中央宣传部担任秘书工作。1926年春，翻译出版《共产主义ABC》一书，在宣传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1927年10月，与瞿秋白等5人主编中央机关刊物《布尔塞维克》。他还担任过《向导》、《新青年》



的编辑。他懂得英、法、德、俄等多国语言，在他一生中，翻译马列著作和外国文学作品数十部，写下诗歌数百篇，撰写文章、回忆录等达数百万字，许多文著在国外用多种文字出版。1998年香港出版了他的著作《史事与回忆》三卷本，100余万字。他说：“不仅漳平是我的故乡，中国所有的县都是我的故乡，世界所有的国家也都是我的故乡。”

郑超麟是阅尽沧桑的历史见证人。有人称他是“活的百科全书”，有人诗赞：“此老人间能有几，沧桑阅尽四朝中。”郑超麟先后参加过“五卅运动”和上海工人武装起义。1925年1月12日参加中共四大任记录员。1927年参加中共五大，并出席党的八七会议，是早期上海区委7名委员之一。任过湖北省委宣传部长，代理湖北省委书记，出任中央出版局局长。1928年7月，他受中央委派，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到福建帮助处理党务，参加在厦门鼓浪屿召开的中共福建“一大”，为在白色恐怖下福建党的组织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29年，他因托派问题，被开除出党。他曾3次被捕累计被监禁达34年之久。第一次被捕是在1929年3月18日，他和夫人刘静贞因受别人连累，被国民党抓去关押40天后被保释。第二次被捕是在1931年5月21日，他夫妇又被国民党逮捕，关到1937年8月29日出狱，这次关押达6年之久。1952年12月22日，他和夫人又变成阶下囚，他本人被监禁达27年之久。1979年6月5日恢复公民权，任上海市政协委员。不寻常的经历与磨难，使他成为“新闻人物”。中央电视台记者、电影编导及演员、史学工作者和专业作家，还有不少战友的后代经常去采访走访他。毛毛写的《我的父亲邓小平》一书中，有3处详细记载郑超麟与邓小平在欧洲和中央工作期间交往的不寻常经历。在电视纪录片《邓小平》中也两次出现郑超麟谈邓小平的镜头。还有许多影视作品、报刊杂志登有他的回忆文

章及访问记等。

虽然一生坎坷，历尽磨难，但他晚年依然顽强豁达，勤奋写作。他是一位不寻常的世纪老人。他留下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

(原载《福建党史月刊》1999年第10期)

# 解读《世纪老人——郑超麟》

郑庆荣

我对福建“普罗米修斯”式人物的了解是从黄文光撰写的《世纪老人——郑超麟》一文开始的(载《福建党史月刊》1999年第10期)。读了这篇文章,才知道本世纪福建曾出现过这样一位非凡人物:最早加入中国共产党,最早翻译《共产主义ABC》,并为中国引进“十月革命”和马克思主义作过巨大贡献。他的生命力极其顽强,几乎跨越了整整一个世纪。他历尽沧桑而又笔耕不辍,无论是笔下还是身上,都折射出多姿多彩的时代印记和历史光芒。他如同一座宝窟,蕴藏着党史资料的丰富宝藏。我想,对他的解读,收获一定是丰硕的。

循着黄文光文中的线索,我尝试了这项工作。先是找来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邓小平》的录像带,重新阅看起来。这部文献纪录片有许多当事者对历史的回忆,采访对象中,年龄最大的是郑超麟。那时,他已经95周岁了。屏幕上,只见这位老人精神矍铄,饱经风霜的脸庞上,架着一副可以看出几个圈的厚眼镜。他端坐着,但从硬朗的身架可以想见个头一定不小。头上白发稀疏,老人斑十分明显。那副慈祥、睿智的模样一看就给人深刻的印象。讲话的声音清晰而洪亮,很有点仙风道骨的样子。

郑超麟讲述了他与邓小平相处过程中的两个故事。

第一个是发生在1922年的事。郑超麟1919年到达法国,比邓小平早一年。他们都是五四运动前后,为寻求救国救民道路而

远走异国他乡的青年学生。当时法国是比较先进的欧洲国家。为了师夷之长,蔡元培、吴玉章等人发起了留法勤工俭学会,动员一批青年人到法国一边学习,一边打工。希图藉此培养中国的新生代。郑超麟、邓小平就是在这个时候来到当时被认作“自由故乡的法兰西海岸。”

但是,法兰西不是天堂。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欧洲,经济萧条,大批从战场下来的军人,挤占了大部分的就业机会,原先设想依靠打工维持读书的留学生们面临着失学、失业和饥饿的窘境。为了活下去,留法学生们四处奔波,邓小平和郑超麟就是在找工作时遇上的。1922年2月,他们在夏莱特市的哈金森橡胶厂的一个制鞋车间打工时,会到一起的。彼此朝夕相处,同在一个车间劳动,同住一间公共宿舍。郑超麟回忆说:“他(邓小平)的年龄最小,除了他以外,恐怕都是20岁以上的人了。我们大家都喜欢他,就是把他当作小孩子,喜欢同他讲话,同他说笑话,同他玩。”在这一年6月,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郑超麟等18位留法学生在巴黎郊区的布罗区森林里开会,决定成立“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不久,邓小平也加入了这个组织。他们一起成为信仰共产主义的中国早期革命者,成为了为共产主义而奋斗的战友。

第二个故事讲的是大革命失败后与邓小平一起在上海的一段经历。1927年是中国革命史上最为悲壮惨痛的一年。蒋介石无耻地背叛革命,发动了“四·一二”政变,残酷屠杀中国共产党人。上海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汪寿华被秘密杀害,中国共产党主要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在北京英勇就义,大革命时期深受群众尊敬和爱戴的党的活动家陈延年、赵世炎、罗亦农、向警予、陈乔年、夏明翰、郭亮等相继牺牲。为纠正错误,挽救革命,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郑超麟和邓小平都参加了这次会议,一起听取了新来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罗米那兹所作的关于

《党的过去错误及新的路线》的报告和结论，听取了瞿秋白代表中央常委作的工作报告。会议决定党的组织分设：长江、南方、北方、上海 4 个局，郑超麟和邓小平都分配在上海局，也是中共中央的办公所在地。对那一段工作，郑超麟说：“那时白色恐怖很厉害，我们中央各部门就不来往了。邓小平和中央秘书处住的地方我从来没见过，并且也不许去。”

但是，患难与共的战友难免也有特殊情况。那是邓小平与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书时的同学张锡瑗结婚的时候。1928 年的一天，邓小平和张锡瑗结婚，请中央机关的同志们一起吃饭。这是在巡捕戒备森严的租界地里的一次简朴而别开生面的婚礼。尽管上海滩上白色恐怖笼罩，这间临时借用的餐室却喜气融融，洋溢着人间纯洁与美丽的真情。郑超麟参加了这个宴会，记忆犹新。他说：“这个宴会钱是邓小平自己出的。大家吃完之后，好象菜已经完了，大家还有兴趣再吃，邓小平又另外叫来菜，让大家吃，我心里印象，大概邓小平家里很有钱吧。”

革命者结婚，还要靠家里拿钱。郑超麟谈起近 70 年前的这桩往事，仍充满诙谐和幽默。从这些情节可以看出，两位革命先驱有着很早、很深的个人情谊。

郑超麟一生确实有着浓重的传奇色彩。他 3 次被捕入狱，被囚禁时间长达 34 年，却都顽强地活了下来。在参加邓小平婚礼后的第二年，他就被捕了。那是 1929 年 3 月 18 日下午，他和妻子刘静贞在上海住所双双被国民党抓走，被看押在上海龙华司令部看守所。还算“幸运”，关了 42 天，就“蒙混”过关了。只是妻子刘静贞在女监里感染肺炎，差点送了命，出狱后送红十字会医院治疗了一个多月。

第二次被捕发生在 1931 年 5 月 21 日夜。先关押在租界巡捕房，后引渡到国民党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原定郑超麟为“首犯”

并判处死刑，恰逢上海警备司令换人，新司令“手下留情”，改判 15 年徒刑。先后关押在上海漕河泾模范监狱、南京军人监狱。在这次被捕前，也就是 1929 年 12 月底，他因反对开除陈独秀党籍，同其他 60 人联名签名发表《我们的政治意见书》而被开除党籍。据其记述，当他还被关押在龙华警备区司令部看守所时，忽遇一个新进来的“犯人”，是从印度被引渡回来的地下党员傅大庆。傅大庆悄悄地告诉他，“他在广州看守所遇见胡志明，胡请他设法通知中共中央营救他。”尽管此时的郑已不是共产党员了。但他仍认真履行了共产党员的职责，冒险把消息转告给狱中党的秘密组织负责人。1937 年卢沟桥事变后，国共两党重新合作，国民党政府迫于形势，决定释放政治犯，被关押了 6 年的郑超麟才于当年 8 月 29 日出狱。

第三次被捕发生在建国后。1952 年 12 月 22 日，也就是在斯大林最后一个生日的第二天，郑因“托派”问题再度入狱。不同的是，这回坐的是共产党自己的监狱，而且一坐就是 27 年。在狱中，他潜心研究“词律”、“音韵”，写了大量的诗词和回忆文章。可惜其中不少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没收和付之一炬了。出狱后，他把回忆起来的近百首诗词编辑出版，题为《玉尹残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事求是思想路线重新恢复和发扬。1979 年 6 月 5 日，郑超麟被恢复了公民权，这年 12 月 18 日，又被接纳为上海市政协五届委员会委员。1983 年，继续担任上海市政协六届委员会特邀委员。可以想见，这一切，与邓小平始终倡导和坚持的实事求是路线有着密切的关系。

为了解读这位世纪老人。笔者曾多方寻找他和有关他的著述。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作者篇名索引》第四册中，查阅到郑超麟早期发表的著作和译作就有 91 篇，可惜都未能找到原著。只好再逛书店，却意外地发现刚刚出版的郑超麟译著——《从苏联

归来》。显然,这是解读这位世纪老人的又一条蹊径,于是我迫不及待地读了起来。

《从苏联归来》是法国作家安德烈·纪德 1935 年应邀访问苏联后写的“观后感”。30 年代中期,苏联领导人宣布基本上建成社会主义。为了向世界宣传,先后邀请了 3 位法国著名作家访问苏联,并作了周密的安排。这 3 个人是亨利·巴比赛,安德烈·纪德和罗曼·罗兰。访问后,他们各写了一本书。却是大相径庭的 3 种态度。巴比赛于 1935 年出版的《从一个人看一个新世纪》极力颂扬斯大林,百般盛赞苏联的成就,自己也因此大受吹捧,备获殊荣。纪德于 1936 年出版《从苏联归来》;1937 年又出版《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既肯定了十月革命和列宁,又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直率批评,就被扣上“反苏反共”的帽子。而罗兰则在写好的《莫斯科日记》扉页上亲笔留言:“在 50 年内都不得发表。这 50 年从 1935 年 10 月 1 日算起”,把这本书封存起来,而回避了思想交锋。这 3 种态度,引起了一场世界性的争论。郑超麟在国民党狱中,秘密翻译了战友设法送进的纪德《从苏联归来》法文原本,实际上反映了他支持纪德批评斯大林的立场。郑超麟翻译的《从苏联归来》在 1937 年出版后,产生了很大的政治影响。1989 年,罗兰的《莫斯科日记》在封存 50 多年后,也终于发表了。这时,苏联的政治问题已经病入膏肓,回天乏术。这勾起了人们对当时那场争论的回想,想起那时中肯、善意的批评意见,而领导者为什么听不进去?明白了苏联社会主义大厦坍塌的历史根源究竟何在,认识到了新生事物如果误入歧途也会招致失败的沉痛教训。

苏联的解体毕竟是一面历史的镜鉴。98 岁的郑超麟决定把 60 多年前翻译的《从苏联归来》和《为我的“从苏联归来”答客难》重新出版。并亲自写一篇《六十年前一场世界性争论——译者新序》。新序长约 3000 字,回顾了当年的那场争论,抒发了一个知识

分子对社会问题的认真态度,体现了这位世纪老人的良苦用心。

这篇《新序》的落款时间是1998年4月4日。再过不到4个月,他就与世长辞了。我猜想,这也许就是他的一篇绝笔。万象书坊在这本书的《出版说明》中写道:“郑先生生前对此书出版极为关心,为之撰写新序,并在临终前数次询问印制情况,但终于未及亲见此书出版,了此世纪夙愿,是一遗憾。我们谨以此书的出版,表示对这位在他的个人品格上堪与纪德比肩无愧的世纪老人的深切悼念。”

我甚以为然。这也许是我初步解读的一点领悟吧。

(原载《福建党史月刊》2000年第一期)



# 郑超麟与中共福建“一大”

郑超麟 口述

编者按：1992年9月和1995年10月，厦门市委党史研究室两次派人赴沪访问耄耋之年的郑超麟先生，请他回顾了他与中共福建“一大”的特殊关系。作者将其谈话整理成文后，又进行了查考和订正，现刊登如下，想必对进一步研究中共福建“一大”的历史，有所裨益。

1928年六七月间，中国共产党在莫斯科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福建省委也派了一个代表团出国与会。代表团由三个省委成员组成：省委书记罗明，某同志（原定省委执委葛越溪，后改为团省委书记孟用潜），工人出身的省委委员许土森。罗明等人出国后，福建省委便以省委组织部长陈祖康为代理书记。

陈祖康是漳平人，与我小学、中学同班，同时去法国。第一年在一起学法文，第二年他有钱去进什么大学，我则自修，最后进工厂做工。我同他感情始而疏远，最后断绝往来，因为我看出这个人心术不正，趋炎附势，不能做朋友。1922年夏，我与若干同志在巴黎发起组织“少年共产党”。几个月之后，熊雄同志不识人，介绍他加入我们的组织。他发现我已在这个组织内，便写信给我解释误会，希望恢复同我做朋友，我回了他的信，但对他还是保持冷淡的态度。1925年，陈祖康大学毕业归国，他的家按照古来考中进士衣锦还乡的先例，大摆筵席，祭祀祖宗。他居之不疑。此时熊雄做了黄埔军校秘书长，请他去军校当教官。